



死亡剝奪說與對稱論證

傅皓政*

摘要

死亡剝奪說主張雖然人們在死亡之後不復存在，也不再有任何知覺經驗，但死亡這個事件對此人而言仍可能是不好的，因為死亡會讓他失去如果繼續存活可能獲得的快樂經驗。藉由死亡剝奪說，物理主義者成功說明即使人們在死亡之後不再有任何知覺，卻仍能宣稱死亡對其本身而言是不好的。然而，死亡剝奪說卻必須面臨對稱論證的挑戰。對稱論證主張出生前和死亡後都是不存在的狀態，人們對待兩者的態度應該要是相同的，既然人們對於出生前的不存在狀態不覺得有任何損失，那麼也不應該覺得死亡後的不存在狀態有任何損失。不過，這個結論顯然和許多人的直覺大相逕庭。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人對於出生前與死亡後不存在狀態的態度是不對稱的。本文目的便是要論述人們對死亡後與出生前不存在狀態的不對稱態度是合理的，或者說對稱論證並不會對死亡剝奪說的觀點產生威脅。

關鍵詞：死亡、剝奪說、對稱論證、Lucretius

* 傅皓政：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

投稿日期：2020年5月7日；採用日期：2020年9月18日

壹、前言

古希臘學者Epicurus認為，一般人恐懼死亡的理由是因為感到死亡對其自身而言顯然是不好的，¹但他認為如果深入思考的話，似乎找不到好的理由證成應該將死亡視為對其自身是一件不好的事而恐懼死亡。Epicurus的說法是：「當我們存在時，死亡未曾到來；一旦死亡到來，我們已不復存在。」（Laertius, n.d./1925）²按照Epicurus的論證——當死亡降臨，某人便不復存在。既然這個人不復存在，那麼他便不會再有任何的知覺經驗，換言之，這個人就是處於經驗空白（experience blank）的狀態，³無法感受任何的快樂和痛苦。然而，對任何人而言，所謂對其自身而言是好或不好的關鍵因素，就在於本身能否感受到快樂或痛苦，⁴既然在死亡之後沒有任何快樂或痛苦的經驗，當然死亡對其自身而言就沒有好或不好的問題。

然而，當代哲學家如T. Nagel等人雖然接受Epicurus的觀察，亦即死亡之後是處於經驗空白的狀態，無法擁有任何快樂或痛苦的經驗，但是，他們並不同意Epicurus的結論，他們主張即使某人在死亡之後處於經驗空白的狀態，我們仍可以聲稱死亡這個事件對死亡者本身而言是不好的，其理由並非某人在死亡之後還會感受到什麼痛苦的經驗，而是死亡剝奪了某人如果繼續存活可能擁有的快樂經驗，這個觀點被稱為「死

¹ 在本文中出現的對某人「好」與「不好」是根據英文“good or bad for him or her”的翻譯，筆者原本考慮用「幸」與「不幸」做為翻譯，但其中文語意仍然容易導致誤解，所以仍決定用一般習慣使用的翻譯，避免讓讀者誤解。

² 雖然Epicurus的著作不少，但僅有少數的著作仍被保留在Laertius（n.d./1925）的《名哲列傳》（*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一書中，此處提到Epicurus關於死亡的說法，則是收錄在《名哲列傳》中的〈給美諾西厄斯的信〉（Letter to Menoeceus）。

³ 從Epicurus的敘述中，不難看出他採取的預設是物理主義觀點，所謂的好與不好是由人們可以感受的快樂與痛苦決定，所以，當某人死亡之後沒有感受的能力，自然就沒有快樂與痛苦的經驗。支持死亡剝奪說（deprivation account of death）的學者與Epicurus相同，基本上接受物理主義的預設，因此，本文同樣採取物理主義的預設探討死亡剝奪說的問題，不會涉及物理主義與二元論的爭議，換言之，本文不涉及死亡之後是否有靈魂存在或者靈魂是否有感受能力的問題。

⁴ Epicurus被稱為享樂主義者，他指出生命的目標就是追求快樂，而這個目標包括沒有身體上的痛苦（aponia）以及心靈上的釋放（ataraxia）（Woolf, 2009）。

亡剝奪說」。筆者認為死亡剝奪說的確成功地說明，為什麼我們能夠宣稱即使在死亡之後某人處於經驗空白的狀態，死亡這個事件對其自身而言是不好的。但是，每個人的不存在狀態並非僅在死亡之後，事實上在出生之前也是同樣處於不存在的狀態，當然，也同樣處於經驗空白的狀態。既然死亡剝奪說主張死亡後不存在的狀態對某人是「不好的」，那麼是否也應該同時主張出生前不存在的狀態對某人也是「不好的」呢？

至於如何看待出生前與死亡後不存在的狀態呢？以下將從T. Lucretius Carus（以下簡稱Lucretius）⁵提出的對稱論證開始進行探究。首先，Lucretius贊成Epicurus的觀察，即死亡後的人無疑地是處於經驗空白的狀態，然而，他進一步指出人在出生前顯然也是處於經驗空白的狀態，這意味著死亡後與出生前的不存在狀態是對稱的。所以，如果我們認為死亡對某人而言是不好的，那麼這個想法應該同樣適用於看待出生的情況，也就是說人應該對未能提早出生感到遺憾。但事實上，我們雖然常聽到人們恐懼死亡的降臨，卻鮮少聽到有人對於未能提早出生感到任何遺憾。因此，Lucretius認為既然人們不會對出生前的不存在感到遺憾，又何必對於死亡後的不存在狀態感到遺憾呢？所以，他的結論就是人們無須對於死亡之後的不存在狀態感到任何恐懼（Warren, 2004）。

面對Lucretius的對稱論證，如果主張死亡剝奪說的學者們一方面認為死亡的確對其自身而言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又認為死亡之後與出生前的不存在狀態是不對稱的，那麼他們就必須主張死亡剝奪了某人可能的快樂經驗，但出生之前卻不然。亦即雖然某人在出生前處於不存在的狀態，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被剝奪任何可能的快樂經驗。換言之，許多主張死亡剝奪說的學者並不贊成Lucretius的結論，並嘗試進一步論證死亡剝奪說和不對稱態度是可以相容的。

學者們回應對稱論證的方式主要可以分成兩類。第一種回應是以Nagel（1970）的想法為主，依據心理連續性的觀點，考慮延遲死亡的情況，當我們想像某個人如果

⁵ Lucretius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的詩人與哲學家，生卒年大約是在西元前99年至西元前55年間，傳於後世最重要的著作是《物性論》（*De Rerum Natura*）。在《物性論》一書中，Lucretius以詩歌的方式闡述Epicurus學派的哲理，尤其是原子論的學說。對於研究Epicurus學派哲學觀點的學者而言，Lucretius的著作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在其死亡的時刻並未死亡而存活下來，由於倖存的這個人和死亡之前的那個人有著心理上的連續性，因此是同一個人。反之，考慮提前出生的情況，當我們想像某人提前出生時，想像中提前出生的這個人和我們所知道的人是否還是同一個人？Nagel的答案是否定的。因此，他認為我們想像某人延遲死亡乃是邏輯上可能，然而想像某人提前出生卻是邏輯上不可能的。第二種回應則是以D. Parfit為首提出的觀點，他認為因死亡而失去的可能經驗與未能提早出生的可能經驗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因為人類的特性就是我們並不在意過去的快樂經驗，但卻非常在乎未來可以擁有的快樂經驗，也就是說我們偏好快樂的經驗最好在未來發生；另一方面，對於痛苦經驗的態度，我們則會希望已經發生在過去而不希望是未來即將發生的（Parfit, 1984）。換言之，我們之所以對死亡後與出生前的不存在狀態抱持不同的態度，其實是來自於對過去和未來的經驗會有不同的偏好所致。⁶

在本文中，筆者嘗試證明第一種回應方式比第二種回應方式好。不過，Nagel的論證有些缺陷需要克服。例如，若純粹從邏輯可能性的觀點來看，設想自己提早出生似乎並不是邏輯上不可能，比如想像自己和蘇格拉底（Socrates）是同時期的人，並且和蘇格拉底對話並非難事。⁷關於第二種回應，Parfit等人想要藉由人們對過去經驗與未來經驗的態度有所差異，證明不對稱態度的合理性，但是筆者認為這個策略並不成功。因此，本文中將說明為何第二種回應未能成功地說明不對稱態度，並且用C. Belshaw提出形上的自我與心理上的自我的區分，補足第一種回應的論證缺陷。

⁶ Parfit在《理性與人格》（*Reasons and Persons*）的第八章中論證人們對於在不同時段的經驗抱持不同的態度，例如人們對於過去曾有但現在已經不再有的慾望較不在乎。對於出生前與死亡後不存在狀態的比較，其實取決於我們如何評價不存在狀態。如果我們認為不存在狀態是不好的，那麼這個不好如果發生在過去（即出生前），根據Parfit不同態度的主張，我們是比較不在乎的。但是，如果這個不好發生在未來（即死亡後），我們顯然會感到難受（Parfit, 1984）。

⁷ 在模態邏輯（modal logics）中探討許多不同的邏輯可能性，因此會有不同的邏輯可能性的觀點。但是Nagel在談論邏輯可能性之時，加入了人格同一性的因素，所以筆者在此處談論的邏輯可能性同樣會加入人格同一性的觀點，也就是在此處設想在蘇格拉底時期和蘇格拉底談論的「我」和現在的我是同一個人。

貳、死亡剝奪說與對稱論證

人們是否恐懼死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可以持續追問：「人們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證成我們應該對死亡感到恐懼？」對於這個問題，古希臘哲學家Epicurus的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他認為人們恐懼死亡的理由，不可能來自死亡這個事件讓其本身感受到什麼痛苦的經驗所致，因為某人在死亡之後，所有的感官便隨之停擺而不再運作，此時，其本身處於經驗空白的狀態。換言之，沒有任何人在死亡之後，還可以擁有感受到死亡這個事件對其本身帶來什麼快樂或痛苦的經驗。因此，我們當然無法聲稱死亡這個事件對死亡者本身是好或不好的。既然死亡之後就沒有感覺，死亡者本身就不可能感受到死亡對其本身是不好（Laertius, n.d./1925），那麼，人們有什麼理由恐懼死亡呢？

對於人們無端恐懼死亡的想法，Epicurus的確提出一個相當具有說服力的論證。此論證主張人們恐懼死亡之後的痛苦，只是未經理性思考的想法而已，一旦人們了解對死亡者本身而言，死亡之後並不會再有任何感到痛苦的經驗，人們就會明瞭其實根本無須恐懼死亡。對於Epicurus的論證，許多學者同意其對死亡的觀察，由於死亡會奪去死亡者的所有感受能力，所以死亡這個事件當然不會帶給死亡者本身任何的痛苦經驗。然而，Epicurus只觀察到死亡這個事件不會讓死亡者本身感受到任何實際上的痛苦經驗，但卻忽略了可能經驗帶來的衝擊。因為從可能擁有的經驗的角度來看，人們之所以會對死亡感到恐懼，並非基於死亡會帶來什麼痛苦的感受經驗，而是因為死亡會讓人們失去一些可能的快樂經驗，⁸這個觀點一般被稱為「死亡剝奪說」。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個令人悲傷的故事：就在2020年1月26日，著名的NBA球星Kobe Bryant（以下稱Kobe）因搭乘的直升機墜機而離開人世，對於喜愛Kobe的人而言都深深感

⁸ 對於什麼是「可能」的快樂經驗，其實是相當值得討論的，尤其是對於存在要求（existence requirement）的課題必須深入討論。筆者在此處採取S. Kagan教授所說的「溫和」而非「嚴格」觀點的存在要求，這兩個觀點的差異在於嚴格觀點的要求為，某事件對某人而言是不好的，僅當事件發生時，某人同時存在；溫和觀點則僅要求，某事件對某人而言是不好的，僅當事件發生時，某人存在於某些時刻或其他時刻（Kagan, 2012, p. 222）。

受到痛苦，無疑地，Kobe的死亡對很多人而言都是不好的。然而，他死亡的這個事件對Kobe本身而言究竟是否也是不好的呢？從Epicurus的觀點來看，由於Kobe在死亡後其實不會再有任何感受，死亡並未帶給他任何痛苦或不好的感受，所以死亡對Kobe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可言。但若從死亡剝奪說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想像對Kobe本身而言，如果這個墜機事件並未發生而他可以繼續存活的話，那麼他就依然可以和美麗的妻子以及四個可愛的女兒繼續快樂地生活著。由於Kobe失去了這些被設想他若繼續存活能夠享有的快樂經驗，所以，死亡這個事件對Kobe而言是不好的，原因就是死亡讓Kobe失去了可能的快樂經驗。

接下來，讓我們轉向Lucretius提出的對稱論證。Lucretius在《物性論》中提到對稱論證：⁹

正是在那個時候到來時我們再無痛苦——當迦太基人從各方而來發動戰爭，而在蒼穹之下的世界因為戰爭而被攪亂，王國殞落，陸地與海洋的疆界都已模糊。但是我們的身體與靈魂分開，就不再有任何事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了，也不再有任何感覺了，什麼都沒有了，即使大地與海洋、海洋與天空都混在一起。

回頭看看在我們出生以前的綿長時間中，我們也是什麼都沒有，因此，自然提供了這個對照於我們即將面對的死亡的到來之後。（Warren, 2004, p. 58）

依據Lucretius的說法，如果我們認為死亡對死亡者本身而言是不好的，而其理由是死亡使得某人不再存在，那麼同樣地某人在出生之前也是不存在的狀態，因此，如果我們認為死亡後的不存在是不好的，便應該以同樣的態度來看待出生前不存在的狀態。換言之，我們也應該認為出生前的不存在對某人而言是不好的，或者說應該對於未能提早出生感到遺憾。但是，沒有人會對出生前不存在的部分感到遺憾，所

⁹ Lucretius的對稱論證出現在《物性論》DRN 3.832-42與DRN 3.972-5這兩個段落，原文是拉丁文，此處的翻譯是根據Warren（2004）著作中的摘譯而來。

以，同樣沒有理由要對死亡之後不存在的部分感到遺憾，因此，死亡之後的不再存在對某人而言也不會是不好的。簡言之，依據Lucretius的說法，我們沒有理由對於兩段同樣不存在的部分——出生前的不存在與死亡後的不存在——抱持不同的態度。僅將Lucretius的論證（Lucretius' argument, LA）重構如下：

- 一、面對相同的不存在狀態，我們的態度應該相同；
 - 二、出生前和死亡後是相同的不存在狀態；
 - 三、如果我們認為死亡後的不存在狀態對自身是不好的，那麼就應該認為出生前的不存在狀態對自身是不好的；
 - 四、我們並不會認為出生前的不存在狀態對自身是不好的。
- 所以，五、我們不應該認為死亡後的不存在狀態對自身是不好的。

支持死亡剝奪說的學者們顯然並不會同意對稱論證的結論，因為依據死亡剝奪說的觀點，人們的確有理由認為死亡後不存在的狀態對自身而言是不好的。然而，上述的對稱論證無疑是個有效論證，所以，支持死亡剝奪說的學者們會認為問題出在哪一個前提呢？很明顯地，在整個論證中最可疑的是前提二，出生前與死亡後不存在的狀態真的相同嗎？

參、心理連續性論證

在當代研究死亡哲學的學者中，最早注意到並嘗試回應對稱論證的哲學家就是Nagel，如上節所述，他採取的策略正是否定LA的前提二成立，也就是主張死亡後的不存在和出生前的不存在並不是相同的狀態。

基本上有三種問題，……第三種就是上述提到關於對出生前與死亡後的不存在態度不對稱的困難。¹⁰（Nagel, 1970, pp. 75-76）

¹⁰ Nagel（1970）提到死亡哲學有三個需要處理的問題，除了對出生前與死亡後不存在的態度

根據Nagel（1970）的說法，死亡後與出生前不存在的狀態是不對稱的，也就是說，對某人而言，死亡後的不存在的確剝奪了可能的快樂經驗，但是出生前的不存在卻並未剝奪任何可能的快樂經驗。Nagel以未出生的孩子來說明他的觀點：考慮死亡的情況，每個人在死亡之前都是存在的，所以當他死亡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想像如果他沒有死亡而繼續存活的話，他可以享受到什麼樣的快樂經驗，由於他的死亡使得他無法享受這些經驗帶來的快樂，所以對其自身來說無疑是損失。相較於死亡的情況，出生的情況卻大不相同，我們很難想像在出生前可以享受到的快樂經驗是什麼？所以，我們無法想像出生前不存在的狀態對某人有任何損失可言。

當某人死亡，……他失去了生命，如果他沒有死亡的話，他將會繼續存活，那就會繼續享有活著時可以享受的美好經驗。……事實上貝多芬沒有小孩，這件事對貝多芬而言可能是遺憾，或者說是件憾事，但是我們不能將任何不幸歸屬於這個未出生的小孩。（Nagel, 1970, p. 78）

Nagel（1970）認為某個個體出生前不存在的狀態對其他人來說或許是一種不幸，例如非常期待能有小孩的夫妻卻無法生育擁有小孩，對於這對夫妻而言，由於他們強烈感受到無法擁有小孩的痛苦，所以是一種不幸。但是，我們卻不能將任何不幸歸諸於未出生的個體，因為這個個體不曾存在過。

基本上，筆者認為Nagel（1970）對於無法歸諸任何不幸給未出生的個體的觀察是正確的。¹¹不過，其論證仍然有一些問題必須澄清，首先，他指出：

是否對稱的問題之外，另外兩個問題就是：一、如何在對某個事件沒有實際不愉快經驗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說某個事件對某人而言是不好的？二、如何將死亡這個事件的不幸歸諸哪個主體？是哪個主體？或在哪個時間存在的主體？第一個問題就是死亡剝奪說所要回答的問題，而第二個問題則是與存在要求相關。

¹¹ 對於我們如何理解從未存在的個體以及認定這些個體是否被剝奪可能的快樂經驗，Kagan教授在其著作中有精彩的論述，如果我們採取同意這些從未存在的個體都因為我們的緣故而被剝奪可能的快樂經驗，那麼我們的道德負擔將會非常沉重。試想，我在路上與某位女性錯肩而過，沒有任何眼光交會或交談，但是如果我停下來與她聊天，可能會有後代。換言之，有一個可能存在的個體因為我的錯肩而過而導致他不存在，那麼我是否需要為他感到

除非能夠將好或不好歸屬於某個胚胎，甚至是尚未結合的配子，否則無法說未能出生是一種不幸。（Nagel, 1970, p. 78）

對Nagel而言，某個個體能夠被歸屬好或不好成，為該個體是否遭受不幸的必要條件。讓我們考慮出生前和死亡後的不存在狀態，Nagel認為我們很容易想像將好或不好歸屬於某個死亡後的個體，如設想某人在死亡後我們會嘆息並且說：「如果你還繼續存活的話，那麼就可以享受天倫之樂了。」但是對於出生前不存在的狀態則不然，我們無法歸屬任何好或不好給個體出生前不存在的狀態。因此，Nagel進一步主張我們無法想像人可以提早出生，一旦設想某人提早出生，這個提早出生的人和現在的某人必不是同一個。由此可以推論，出生前不存在的部分，對任何人而言都不會是損失，因為我們不會將任何的好或不好歸屬於出生前不存在的部分。

但是我們不能說一個人出生之前的時間是他本來可以活的時間，也就是他可以早些出生。除了早產所允許的短暫餘地之外，某人不可能提早出生，任何比他早生的人都會是其他人。因此，在他出生之前的時間不是他的後續出生可以生活的時間。一旦他出生這件事發生，並不蘊涵有任何生活上的損失。（Nagel, 1970, p. 79）

然而，即使我們同意Nagel（1970）的觀察，任何人出生前的時間都不能歸屬於某人，但如果考慮延遲出生的情況，是否會有所不同呢？

考慮下列的例子。試想有某對夫妻因為難以自然受孕的緣故，所以尋求醫生的協助以將受精卵植入子宮的方式受孕，也就是一般所稱的試管嬰兒。在試管中受精卵形成的過程十分順利，然而，就在受精卵要植入母體子宮之前，醫生突然發現母體的子宮有些問題需要治療，目前並不適合將受精卵植入母體子宮，於是醫生建議將受精卵

抱歉呢？這是對可能的快樂經驗更深入的質問，Kagan教授認為當然不必對這樣的情況感到遺憾或抱歉，也就是說，我們所談論的可能經驗都是對至少確實存在過的個體而言（Kagan, 2012, p. 218）。

暫時冷凍在儲存庫中，等待母體的子宮治療妥當適合生育時再解凍植入。沒想到母體的治療時間漫漫，等到其子宮適合植入時，不知不覺已經過了10年的時間，冷凍10年的受精卵終於順利植入子宮，孩子也順利隨之誕生。然而，在他成長的過程中，社會變動得非常快，除了物價飛漲，房屋也越來越昂貴，實質薪資也不斷地縮水。就在孩子長大成人之後，他感覺到目前的經濟情況對年輕人非常不友善，與10年前的情況差異很大。就在此時，父母和他談到冷凍了10年的受精卵這段往事，他赫然發現，如果可以早10年出生，那麼或許可以跟上10年前的經濟榮景，成長故事自然完全不一樣，而不會在目前經濟衰退的情況中感覺有志難伸。

但是，讓我們想想看，如果他真的在10年前順利植入母親的子宮著床並且出生，他與現在的自己還是同一個人嗎？如果以受精卵的觀點來看，不管是在10年前出生或者是現在出生的自己，顯然都是從同一個受精卵發展而來，所以當然是同一個人，我們通常將這種以是否為同一個身體延續的觀點，稱為肉體觀點的同一性判準。¹²除了肉體觀點的同一性判準之外，還有另一種相當具有競爭力的同一性判準，即人格觀點的判準，即使是同一個受精卵，但是在不同時間開始成長，其成長軌跡自然大不相同，即使是相同的一對父母，由於其父母也是處在完全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狀態下撫養小孩，所以孩子形成人格的過程也會有很多相異之處。更不必說，他因應社會變化而產生的學習目標也會完全不同。所以，問題是：處在全然不同信念、記憶、慾望、志向與抱負等心理狀態的兩個個體仍然是同一個人嗎？如果以人格觀點的判準來看，由於這兩個個體的人格鏈沒有任何接續點，¹³所以是不同的兩個人。然而，Nagel

¹² 在肉體觀點的同一性判準中其實還隱藏另一個問題，在這裡我們預設10年後原有的受精卵可以順利著床並出生，但是如果10年後受精卵已經無法再行著床而出生的話呢？這段受精卵冷凍時期損失的可能經驗還算是損失嗎？如果在受精卵再也無法出生的情況下，我們認為這些損失不再是損失，而在可以出生的情況下，這些損失才算是損失的話，那麼Nagel（1970）主張人不可能提早出生的觀點就會受到挑戰，因為這個被延遲出生的人的確有機會提早出生。

¹³ 筆者在這裡提到的人格鏈，是指連續且有連結的心理狀態，這些心理狀態包括信念、記憶、慾望、志向與抱負等。Kagan在《死亡》（*Death*）一書中以繩子來比喻人格觀點，這裡提到的信念、記憶、慾望、志向與抱負等心理狀態，每個心理狀態如同構成繩子的纖維，沒有哪一條纖維的長度足以從繩子的開頭到繩子的結尾，也沒有哪些繩子必比其他繩

（1970）在論述出生前的時間是否可以歸屬某人時，並未明確指出這兩個觀點可能出現的差異，但筆者認為這兩個觀點的差異正是最關鍵之處。在第伍節的論述中，將嘗試對Nagel觀點遭遇到的困難提出具有說服力的方案。現在，暫且轉向說明偏好觀點的論點。

肆、偏好觀點及其問題

偏好觀點主張人們對過去經驗與未來經驗的喜好程度是有差異的，人們總是希望快樂經驗可以在未來發生勝過過去發生過的快樂經驗，而面對痛苦的經驗，人們總是希望留在過去而不希望在未來面對它。提出偏好觀點的學者Parfit在其《理性與人格》著作中，提出一個設想的例子說明這個成見的合理性：

設想我現在在某家醫院準備接受某項手術，這項手術相當安全且通常都會成功，由於我知道這些，所以對於手術結果不會有任何懼怕。這個手術也許很快，但也可能會花上一段時間，由於我有另一項手術必須一起進行，所以我不能麻醉，我之前曾經動過相同的手術，所以我知道該手術過程非常痛苦。然而，現在有個新技術，就是由於手術過程雖然痛苦，病人可以服藥在手術幾小時後忘記在手術過程中承受的痛苦。

我剛剛醒來，也不記得什麼時候入睡的。我問護士我的手術如何？時間多長？但護士說她知道我和另一個病人其中的確有一人已進行此項手術，但是她不記得是誰。她只記得我可能是昨日已動過手術的那個人，如果是的話，那麼昨天的手術足足持續了10個小時，或者我是待會兒要動手術的病人，那麼手術時間會縮短很多。因此，我可能是昨天承受了10小時痛苦的那個人，或者是等會兒即將承受1小時痛苦的病人。

當我想要再問清楚時，發現護士已離開。對我來說，我比較希望哪個是真的

子更重要，有的長些，有的短些，一如人們的信念、記憶、慾望、志向與抱負等交纏的心理狀態（Kagan, 2012, p. 130）。

呢？如果我發現我是已經承受過痛苦的那個病人，顯然會有如釋重負的感覺。（Parfit, 1984, pp. 165-166）

在Parfit的例子中，我們不難發現，人類對過去與未來痛苦經驗的態度的確是不對稱的，就算發生在過去的痛苦經驗持續時間較長，或者痛苦的程度較高，但是就某人當下的想法來看，他仍然希望自己是已經承受過痛苦的那個人。原因就在於如果這個痛苦經驗已經過去了，那麼在未來就不用再經驗任何的痛苦，這就是Parfit主張以人類的偏好而言，人們總是希望未來不會發生痛苦的經驗。¹⁴

Parfit的偏好觀點聽起來很有吸引力，且能夠明確指出過去經驗和未來經驗的差異。但是，這個觀點是否可以用來反駁LA呢？

表面上看起來，Parfit的偏好觀點可以說明人類對過去與未來經驗的態度是不同的。但Brueckner與Fischer（1986）指出Parfit的偏好觀點無法用來反駁LA，最關鍵的因素是，Parfit所說的手術過程所經受的痛苦經驗，無論如何仍然是某人可以親身感受到的痛苦經驗。但死亡的情況完全不同，如同Epicurus所說，人在死亡之後就再也無法感受到什麼快樂或痛苦的經驗。「Parfit的結論只能應用在人實際可以感受到不好的經驗的情況，類似於Parfit例子的結構，但其實是感受不到的經驗，產生的態度反而是對稱的」（Brueckner & Fischer, 1986, p. 216）。不過，某人感受不到的經驗不見得對某人而言完全無所謂，也就是說，即使某人沒有感受到的經驗也可能對他造成傷害。一如Nagel舉出遭朋友背叛而不自知的例子，說明人處於經驗空白狀態仍然會被視為受到傷害，而死亡與被朋友背叛而不自知一樣，都是處於經驗空白的狀態。¹⁵

¹⁴ Parfit認為即使在沒有麻醉或服藥忘記手術過程的情況下，即使過去痛苦的經驗強度更大或是持續時間更長，人們仍然會希望痛苦的經驗是發生在過去而不是未來。「第二種情況：當我醒來的時候，我記得昨天經歷了一場痛苦的過程，但我忘記時間持續了多久。我問負責照顧我的護士我的手術是已經完成了？還是還要動其他手術？一如前述，她只知道有兩個病人的事情，但不知道我是哪一個。如果我是前者，就是昨天已經經驗過5小時的痛苦手術過程，如果我是後者，那麼我就已在昨天經過2小時的痛苦，但稍後還有1小時的手術痛苦過程必須承受」（Parfit, 1984, p. 167）。

¹⁵ Nagel所舉的這個例子經常被引用來說明某人未經經驗到的事件仍然可視為對某人已造成傷害。設想當你不知道朋友背叛你時，仍然將對方視為至交好友對待，我們會同意此時即使

Brueckner與Fischer（1986）的論題可以歸納如下：一、死亡是處於經驗空白的狀態，因此死亡對某人而言是不好的，原因並不在於某人在死亡後感受到什麼不好的經驗，而是他被剝奪了如果繼續活著能夠享受到的美好經驗。二、對於死亡後與出生前不存在的狀態，兩者經驗空白的情況是相同的，對某人而言都是損失，兩者的不同在於我們對於過去經驗與未來經驗的成見（bias）。

現在是1985年而且無論如何你可以活到80歲，假設你現在有以下的選擇，其一是你出生在1915年並且會在1995年死去，或者你出生於1925年且於2005年死去，並且假設兩個情況所得到的快樂與痛苦都是相同的，很顯然你會比較偏好第二個選項——亦即你希望好的經驗會發生在未來。（Brueckner & Fischer, 1986, p. 219）

這兩個選項分別有10年的經驗空白階段，第一個選項是1995～2005年，第二個選項則是1915～1925年，對於活在1985年當下的人而言，他會如何看待這兩個經驗空白時期呢？依據Brueckner與Fischer的說法，此人顯然會認為第二個選項是比較好的，換言之，出生前的尚未存在與死亡後的不復存在雖然都是經驗空白時期，仍然可以被比較，如果在相同條件下，人們的偏好會希望繼續生活的時間多一些。Brueckner與Fischer嘗試用同樣長度的時間說明我們的確對於過去經驗與未來經驗的偏好不同，因此，筆者將這個論證稱為「平移論證」，意思就是將整段時間往前移動10年，但是存活的時間長度是一樣的。基本上，Brueckner與Fischer藉由平移論證得到兩個重要的論點，用以說明我們對於出生前尚未存在與死亡後不復存在兩者的不對稱態度是合理的，這兩個論點是：一、相較於未來的經驗，過去的經驗顯得一點都不重要，畢竟已

你並未實際感受到朋友背叛的痛苦經驗，實際上卻也已受到傷害（Nagel, 1970, p. 76）。經由Nagel的啟發，後續出現許多不同而相仿的例子，也使得死亡剝奪說的論證更具說服力，除了Nagel的大腦受損例子外，還有Rosenbaum聽力受損的例子（Rosenbaum, 1986, p. 219）、Fischer所提到的時間差論證，都是嘗試進一步解決感受經驗可能面對的難題的重要論證。

經過去了；二、人類有偏好未來快樂經驗的成見。

不過，Belshaw（1993）認為這兩個論點並非回應LA的好方法，他一方面反駁Brueckner與Fischer認為過去經驗不重要的主張，另一方面也論證即使我們將過去的經驗視為是重要的，也能夠適當地回應LA的挑戰，關鍵在於如何論證出生前尚未存在的經驗空白是不會讓我們感到遺憾的。

首先，讓我們看看Belshaw如何說明過去的經驗並不如Brueckner與Fischer所主張是不重要的論點：

我們並不會認為過去的經驗無關緊要，我們通常喜歡提到美好的過去，也不希望忘掉這些美好。我們甚至會認為如果沒有過去的這些美好經驗，那麼生活就不會像現在一樣令人滿意。……更進一步說，我們有時會希望早些出生，才能享受到那些因出生太遲而無法享受到的經驗，而這個想法是真的要早些出生，而不是僅僅好像要早些出生而已，我們會對過去的不足感到遺憾，不管是生活內容或期間長短，這樣遺憾的感覺甚至會讓我們願意為了彌補過去而犧牲未來。（Belshaw, 1993, p. 106）

為了論證人們會為了過去的記憶而努力，Belshaw（1993）舉了兩個實例加以說明：

一、對失智者而言，過去的記憶逐漸消失是非常令人害怕的。對於患者來說，如果能夠恢復記憶或者阻止記憶繼續消失，即使告知這個患者必須接受某種相當痛苦的手術，患者會接受嗎？Belshaw認為大部分的人是會接受的。因此，過去的記憶並不是不重要的。

二、對許多歷史學家而言，恨不得能夠早點出生參與那些歷史上的大事，即使因為這樣必須要縮短生命也在所不惜。對歷史學家而言。真正在乎的是他的研究是否透徹而真實，如果真的可以早些出生見證當時的歷史，那就真的太好了。從這些歷史學家的想法中可以發現，過去經驗的豐富性要遠比未來的快樂經驗重要太多了（Belshaw, 1993, p. 107）。

不過，筆者認為這兩個例子並不具足夠的說服力。就例一而言，失智症患者所真正在乎的是目前或未來的狀態，而非過去的經驗本身。記憶消失所造成的困擾並不是對失去過去經驗感到遺憾，而是失去這些經驗會對現在或未來的生活經驗造成困擾，比如忘記與重要親人共度時光的重要記憶，會使得自己感到恐懼，害怕因此失去親人，所以，患者寧願承受痛苦的手術恢復記憶或阻止記憶繼續消失，仍然可以說是為了未來的生活著想，而非僅僅為了恢復過去的記憶而已。同樣地，就例二而言，筆者認為這些歷史學家真正在乎的仍然是現在或未來的狀態，而非過去的經驗。根據Belshaw（1993）的說法，歷史學家希望早些出生見證歷史的想法是為了增強其研究的可信度，而這些研究在事件發生的當下與現在的研究資料相較，哪一個時期會讓歷史學家更有機會看到事件的全貌呢？因此，歷史學家真正在乎的是他現在或未來的研究成果是否具備可信度，而非能否親身參與過去的歷史事件。

基於上述的說明，不難發現主張偏好觀點的Parfit（1984）、Brueckner與Fischer（1986），甚至批評偏好觀點的Belshaw（1993）等，都預設我們可以明確區分過去經驗和未來經驗，並且比較我們對於過去經驗和未來經驗的好惡。然而，筆者認為要將過去經驗和未來經驗做出明確區分是非常困難的。如同在失智症的例子中，究竟希望承受痛苦手術的某人，其目的是只想要恢復過去的經驗？還是基於過去經驗對現在與未來經驗的重要性？如果過去經驗對於現在或未來經驗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那麼即使基於偏好觀點的說法，基於人類對於現在或未來經驗的重視，過去經驗也會同樣地被重視。

伍、不對稱態度的合理性

對於Brueckner與Fischer（1986）認為過去經驗不重要的這個論點的批評，筆者並不認為Belshaw（1993）提出的說法具有足夠的說服力。不過，相較於Brueckner與Fischer的論證，Belshaw嘗試用來回應對稱論證的觀點，卻是更具有說服力的論證，因此，雖然筆者不認為前述兩個實例足以反駁Brueckner與Fischer的主張，但仍贊同在解釋不對稱態度上，Belshaw的論證是比較好的想法，原因在於他無須預設人對於過去

經驗與未來經驗會有不同的偏好。由於其論證的核心乃是以人格（person）為關鍵概念，因此，筆者建議不妨將其論證稱為「人格論證」（person argument）。

有個完美的方式可用以說明不對稱態度，我已稍微提及，但要在此說個清楚。我們不想早些出生的理由不在於我們對於過去的經驗沒有期待，而是對於過去經驗有更深入的想法。我並不想早些或晚些出生，主要原因是我不想成為另一個人，而且我也不相信如果我的出生時間改變了，我還能避免成為另一個人。（Belshaw, 1993, p. 110）

Belshaw的人格論證引發我們必須思考一個在哲學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即什麼是「自我」？根據Belshaw（1993）的說法，關於「自我」這個課題，至少有兩個不同的意涵，其中之一乃是形上學意涵（metaphysical sense）的自我，而另一個則是心理意涵（psychological sense）的自我（Belshaw, 1993）。此處提及的「自我」乃是心理上的自我，這就是人格論證中所要談論的「我」。¹⁶心理上的自我不同於形上的自我，其關鍵概念在於如何理解「人格同一性」的想法，即我認為之所以為我的各種要素，這些要素不但包括我這個人，還包括我身邊的人與各種關係，因此，如果我身邊的環境與人物有所變動，那麼我的所有經驗將大不同，在此情況之下，我就無法聲稱我仍是原來的我，換言之，我將會成為一個具有完全不同人格的人。

我可以被設想在1950年形成，但是在1960年才開始有知覺經驗，亦即至少能夠晚些出生。這個想法聽起來似乎是對的，但是這個轉變基本上關切的焦點並非是形上的而是在心理上的自我，不是在不同條件下的我（也許可以說是S. Kripke的觀點）¹⁷ 仍然存在的問題，而是在那些條件下所形成的我，或

¹⁶ Belshaw（1993）在1993年的論文中僅提到了對於「自我」有這兩個不同意涵的區分，但並未深入討論兩者的不同及必須考慮的因素等。因此，在2000年的論文“Later death/earlier birth”中，Belshaw就更清楚地闡釋了這兩個意涵的不同與重要性（Belshaw, 2000）。

¹⁷ Kripke透過固定指稱詞來談論個體，他認為在不同可能世界中，固定指稱詞所指涉的個體都

者說這才是我感興趣的那個存在的我。（Belshaw, 1993, p. 110）

然而，Belshaw（1993）認為對出生前與死亡後不存在的狀態有著不對稱態度的課題而言，其中牽涉到關於「自我」這個概念的詮釋，也就是說，我們在乎的是哪個解釋的「自我」？Belshaw認為「心理上的自我」才是我們所在意的。那麼，什麼是「心理上的自我」呢？

對我來說，我之所以為現在的我——就是具有特定喜好、特定性格、自己的規劃、朋友以及承諾等——這也同時依賴過去的經驗，包括範圍與內容，即以特定方式發生過的事。（Belshaw, 1993, p. 110）

按照Belshaw（1993）的觀點，我之所以為我這個人，就是與目前狀態有關的個人經驗，包括過去的種種經歷。然而，有趣的是未來的事件尚未發生，因此還不會成為限定目前我之所以為我的經驗內容。但是，我對於未來的計畫與想望，都和現在的我有著聯繫，也就是說處於目前狀態的我的想法，所以當然也是限定我之所以為我的一部分。簡言之，過去的種種經歷，以及現在的我對於現在這個狀態與未來的想法，就是構成我之所以為我的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元素，當然，這裡提到的我就是心理上的自我而非形上的自我。因此，對於死亡後與出生前不存在的狀態有著不對稱的態度，這個態度與心理上的自我有著相當重要的聯繫，因為採取什麼態度來面對這兩個非存在時期，就是由我們所擁有的信念決定，而我們的信念也與周遭的環境和自己的經驗歷程緊緊相關。

所以，設想我們的生活有著巨大的改變。每10年我們都經受大量而且似乎是隨機的翻轉，不管是在朋友、嗜好以及職業等，彷彿每過10年我們就如

會是同一個，即不同世界的同一性（transworld identity）；「讓我們將某個詞稱為固定指稱詞，如果該詞在每個可能世界中都指稱同一個對象；如果不是，則該詞稱為非固定或偶然的指稱詞」（Kripke, 1980, p. 48）。

重生一般，性格與心理自我都是經由出生的那個偶然時間及周遭環境的反映。（Belshaw, 1993, p. 112）

基本上，筆者認為Belshaw這部分的觀察非常重要。回到LA，我們想要證明的是前提二並不成立，也就是出生前和死亡後不存在的狀態並不相同。Nagel雖然成功地論證想像一個人提早出生是不可能的，卻不能說明延遲出生的情況，但Belshaw的論證可以成功地說明延遲出生的情況。因為依據心理上自我的理論，無論是提早出生或延遲出生，由於建構心理上的我的環境都會大不相同，形成的人格自然也會不同，所以，都會是與現在的自我不同的另一個人。正如Belshaw所言：

死亡後的不復存在對人們而言是不好的，因為死亡剝奪了如果沒有死亡可能享有的快樂經驗，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設想自己延遲死亡。但是，出生前的尚未存在完全不同，雖然某些人可以提早出生，但是提早出生的那個人不是現在的這個我，這就是不對稱的態度。（Belshaw, 2000, p. 69）

相較於偏好觀點的主張，筆者認為心理連續性觀點更能成功地反駁LA。Brueckner與Fischer（1986）主張對於出生前與死亡後不存在的狀態之所以有著不對稱態度，原因在於我們對於過去與未來經驗的偏好不同所致，並且以平移論證說明我們為什麼偏好未來經驗勝於過去經驗。然而筆者認為，生命歷程相同的假設正是這個論證的最大缺陷。在平移論證中，Brueckner與Fischer認為，當我們在思考出生前尚未存在的問題時，並非假設現有生存的延伸，而是整個生命歷程向前平移，所以依據其偏好未來經驗的主張，我們會選擇未來經驗比較多的生命歷程，但這當然是假設兩個生命歷程都擁有相同的快樂經驗而言。不過，筆者認為這個假設並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許多人經常會浮現如果早10年出生的話，那麼人生將會有多大的不同這樣的想法。然而，這個想法並未考慮到心理上的自我，因為如果繼續追問，早10年出生可能有不同的父母、不同的朋友、遇見不同的教師、同學，甚至從事不同的工作等，那麼還會希望改變嗎？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遲疑。所以，Belshaw（1993）指出我們對出

生前與死亡後不存在狀態的不對稱態度，心理上的自我正是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

陸、結論

對於Epicurus認為由於人們死亡之後並不具備感受能力，所以無須懼怕死亡的主張（Laertius, n.d./1925），其實與一般人的想法並不相同，死亡剝奪說論證一般人恐懼死亡的理由並非因為死亡之後會帶來什麼痛苦的感受，而是被剝奪了可能擁有的快樂經驗所致。然而，Lucretius的對稱論證卻帶來另一個難題，即出生前與死亡後既然都是不存在的狀態，既然無人會對出生前的不存在感到任何遺憾，因此對於死亡後的不存在應該也不會感到遺憾才是（Warren, 2004）。這個主張對於死亡剝奪說而言顯然帶來不小挑戰，因為支持死亡剝奪說的學者必須回應為何我們對於這兩個不存在的時段存在著不對稱的態度？也就是說，為什麼會恐懼死亡後的不存在，卻不會對出生前的不存在感到惋惜呢？Nagel（1970）雖然已觀察到出生做為本質性條件的重要因素，但其論證卻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因為他的主張雖然可以說明人不可能提早出生，但卻無法說明延遲出生的情況。另外，Parfit等人提出的偏好觀點也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原因在於這個理論必須假設不同時間出生的兩個個體可以是同一個人，如此才能夠合理地說明某人的偏好。在不同時間出生的如果是兩個不同的人，那麼就沒有比較偏好的問題了。不過，Belshaw（1993, 2000）提出的形上的自我與心理上的自我的區分，正好可以彌補Nagel論證的缺陷，也就是能夠證明無論提早或延遲出生都不會與現在的自己是同一個人，所以，人會有死亡後不存在的狀態，卻沒有出生前不存在的狀態。因此，心理連續性的論證能夠成功地反駁Lucretius的對稱論證，或者說，死亡剝奪說並不會受到對稱論證的威脅。

參考文獻

- Belshaw, C. (1993). Asymmetry and non-existence. *Philosophical Studies*, 70, 103-116.
- Belshaw, C. (2000). Later death/earlier birth.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24(1), 69-83.
- Brueckner, A., & Fischer, J. M. (1986). Why is death bad?. *Philosophical Studies*, 50, 213-

221.

Fischer, J. M. (2014). Mortal harm. In S. Lup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ife and death* (pp. 132-148).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gan, S. (2012). *Death*.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Kripke, S. (1980). *Naming and necess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ertius, D. (1925).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R. D. Hicks,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n.d.)

Nagel, T. (1970). Death. *Nous*, 4, 73-80.

Parfit, D. (1984).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baum, S. (1986). How to be dead and not care: A defense of Epicuru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3, 217-225.

Warren, J. (2004). *Facing death: Epicurus and his critics*. Oxford,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olf, R. (2009). Pleasure and desire. In J. Warre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picureanism* (pp. 158-178).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Deprivation Account of Death and the Symmetry Argument

Hao-Cheng Fu^{*}

Abstract

The advocates of the theory of deprivation account of death contended that although people no longer exist after death and no longer have any perceptual experience, the event of death may still be bad for him because death will make him lose the possible cheerful experience if he continues to live. I agree that some physicalists have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that even if people no longer have any perception after death, death is bad for them with the aid of the deprivation account of death. However, the theory of deprivation account of death can be challenged by the symmetry argument. The symmetry argument argues that prenatal and postmortem states are the same in the sense of non-existence, so people should have the same attitude toward these two states. Since people do not feel any loss in the state of prenatal non-existence, they should not think there is any loss in the state of postmortem non-existence state. In my opinion, this conclusion obviously violates the intuition of many people. Generally speaking, most people have asymmetric attitude toward the of prenatal and postmortem non-existence state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rgue that people's asymmetry attitude is reasonable, or that is, the symmetry argument will not threaten the viewpoint of deprivation account of death.

Keywords : death, deprivation account, symmetry argument, Lucretius

^{*} Hao-Cheng F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Manuscript received: May 7, 2020; Accepted: Sep. 18, 2020

